

从“无法呼吸”到“漫长窒息”

——起底美国警察暴力

美国司法部近日宣布，将取消与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路易斯维尔市达成的警察改革协议。相关协议旨在解决警察系统性滥用职权及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司法部的决定引发美国舆论哗然，再次揭开美国社会一道久难愈合的伤疤。

5年前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幕让美国人记忆深刻：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一名警察膝下艰难发出“我无法呼吸”的哀求，最终死亡。弗洛伊德家属的代理律师本·克伦普近日痛斥，司法部在弗洛伊德去世5周年之际宣布这一决定，“对每个饱受警察暴力创伤却一再被虚假承诺欺骗的社区来说，都是当头一棒”。

5年来，美国在警察暴力下又出现多个“弗洛伊德”。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至少有1173人遭警察枪击丧生，创历史新高；美国警察暴力的受害者每年至少有30万人。美国学者和媒体指出，种族主义偏见、贫富分化、枪支泛滥和制度性偏袒等社会积弊共同制造了美国警察的暴力底色。同时，美国党争导致暴力执法沉痾始终无解。

5年前的“无法呼吸”，已变成美国社会的“漫长窒息”。

暴力执法的历史基因

“美国警察又杀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这令人意外吗？不。”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明尼阿波利斯分会前会长内基玛·莱维·阿姆斯特朗说，5年前得知弗洛伊德被跪颈而死时，她很痛心但并不惊讶。

阿姆斯特朗的“不惊讶”折射出美国警察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据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统计，2015年到2024年间，美国黑人被警察枪击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的2.5倍；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在一些城市，黑人被警察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数十倍。阿姆斯特朗把美国警察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称作“出于种族动机的谋杀”。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有着深刻的历史基因。美国警察制度起源于18世纪。当时，美国南方出现由白人组成的奴隶巡逻队，负责追捕从种植园逃跑的黑人奴隶。这些巡逻队在追捕过程中被允许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19世纪，随着美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犯罪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一大难题。1838年，美国第一所警察局在波士顿成立，其目的是消除白人中产阶级对高犯罪率的担忧。美国“揭露真相”新闻网站一篇文章指出，从控制黑奴到保护白人财产，美国警察的角色就是通过控制少数族裔来维持社会秩序，“警察暴力构成美国所有‘秩序’和‘安全’的基础”。

种族歧视并非透视警察暴力基因的唯一视角。美国警务公平中心研究员贾斯廷·费尔德曼指出，美国贫穷白人也面临警察暴力威胁。随着社区人口贫困率的上升，警察暴力致死率也随之增加，最贫困社区比最富裕社区的警察暴力致死率高出3倍多。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黑人等少数



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众在写有乔治·弗洛伊德名字的墓碑艺术装置旁参加纪念弗洛伊德遇害五周年的活动。

族裔及贫困人口难以获得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和就业机会，他们的聚居区往往治安更差，警察把这些区域定义为“高风险社区”，执法时更倾向使用暴力。

暴力执法是美国社会制度性不平等的延续，不仅让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面对更高危险，也进一步固化美国警察体系中的种族与阶级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说，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警察维护的是“白人至上主义、经济等级制度以及边境限制”。

暴力催生暴力

“在美国，警察枪击事件及更广泛的警察暴力与枪支泛滥文化紧密相关。”多年研究美国警务问题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迈克尔·谢拉-阿雷瓦洛说。

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据多家机构估算，美国2024年民间拥有枪支数量约为4亿至5亿支，超过美国3.4亿多的人口总数。由于监管不足，还有大量枪支没有被登记在册。

美国“追踪”新闻网站一篇文章说，民间枪支泛滥与警察在执法中动用武力存在直接关联。在枪支管制较宽松的州，警察默认需要采取更极端措施来自我保护，执法时开枪的可能性更大。底特律警察局一名退休副警长说，他和同事在执勤时会假设遇到的任何人都持有致命武器，“这种心态极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枪支泛滥的社会现状还影响美国警察的装备和培训方式。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美国警察越来越多地配备军用级装备，一些警察机构甚至配备步枪、装甲车和反恐防地雷。美国警察在培训中还存在严重“偏科”。美国司法统计局报告显示，美国警察学校把大部分培训时间用于枪械、自卫等训练，涉及警务政策、冲突管理的培训总时长还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美国埃默里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等机构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均表明，警察执法军事化既没能减少犯罪，也没能保护美国警察的安全，却导致警方处理案件时更具攻击性，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枪支泛滥与警察暴力执法之间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以暴制暴的做法无法保障公共安全，反而导致“暴力催生暴力”。

暴力执法问责难

近年来，美国社会针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投诉屡见不鲜，但受到惩罚的警察寥寥无几。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是制度性漏洞和司法偏袒导致的问责困难，不仅纵容了警察滥用职权，也加速警民之间信任崩塌。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警察机构分联邦、州、县、地方四级，各级机构相互独立，自主权极大。这种状况导致联邦层面的问责体系形同虚设，连警察不当执法行为的信息都难以掌握，更难言对其形成约束。

报告还指出，美国法律允许警察部门开展自我调查，这导致大量针对警察滥用职权的投诉在警方包庇下未得到受理。美国俄亥俄州立鲍灵格林大学刑事司法专家菲利普·斯廷森追踪了近年来全美针对警察的诉讼案件，发现在执行公务中致平民死亡的警察中，只有不到2%的人受到犯罪指控。

即便遭指控，美国警察也能从司法偏袒中获得“护身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82年确立对公职人员的“有限豁免权”法律原则，规定警察等公职人员的伤害行为只要不违反“一个理性人应该知晓的宪法和法规”，就可以免责。这一规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使法官在宣判时有较大解释空间，一般要求必须有“一模一样情形的判例”才能裁定执法人员违法，因此法官在此类案件中往往极为谨慎，鲜判警察违法。

有舆论认为，“有限豁免”实际上给警察滥用职权提供了“无限偏袒”，导致不少有“黑历史”的警察长期留在执法队伍中，甚至越放肆无忌。据报道，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时任警察德雷克·肖万在致死弗洛伊德之前，已受到至少17起投诉，其中16起以没有任何惩罚的结果结案。

制度漏洞和司法偏袒为滥用职权的

警察提供了保护，使警民间信任进一步崩塌。美国盖洛普公司等多家民调机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民众对警察信任度波动较大，极易受到短期内的治安状况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分析认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基础十分脆弱，任何一起暴力执法事件都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信任危机。

党争极化带来恶果

“5年过去了，警察改革法案仍未在国会通过，警察部门也仍未受到追究。”在美国司法部21日宣布取消与两个城市达成的警察改革协议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德里克·约翰逊就警察系统改革停滞表示失望。

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公众要求约束警察不当行为、推进警察系统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这项改革至今举步维艰。美国前总统拜登曾承诺广泛改革警察体系，强化问责制度。但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政府在4年任期内，仅与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路易斯维尔市达成警察改革协议，而这些协议如今又被司法部取消。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司法部的这一决定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完全推翻了拜登政府的警察改革政策。

事实上，警察系统改革已成为美国两党互相倾轧、牟取政治利益的牺牲品，摆脱不开一切以选票为先的选举政治，也脱离不了“美国反对美国”的政治现实。

美国媒体分析，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巨大民意压力促使民主、共和两党聚焦警务问题以争取选民支持，但双方相互阻挠对方推进相关政策。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关注焦点转向其他议题，两党随即不再关注警察改革。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乔治·卡马乔说，2024年大选时，美国选民关注重点已经转向经济民生，曾经力推警察改革的民主党也把这一议题“边缘化”。美国学者认为，这种策略性选择暴露出两党在警察改革问题上的功利性。

特朗普在今年1月就职当天废除拜登政府的近80项政策，其中就包括一项有关警察问责的行政令。今年4月，特朗普签署一项加强执法力量的行政令，推进所谓“法律与秩序”相关政策。批评人士认为，这项行政令将进一步增大对警察不当行为追责的难度。

美国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支持率低迷，迫切需要通过此类政策巩固其选民“基本盘”，争取警察团体支持。美国犯罪学专家马斯·诺兰说，诸如此类的政策以维护执法者利益为理由，但目的其实是向其支持者展现姿态。

美国媒体认为，警察议题沦为美国政党博弈的工具，警察改革因政治极化陷入僵局，这是美国制度缺陷和治理失灵的又一表现。路易斯维尔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组织者夏妮尔·赫尔姆说，政策总是随着掌权者的更迭而变化，但事实上，“不论谁入主白宫，这一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